

追随中山先生东征北伐

刘树亮^①

一、初见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

我叫刘树亮，曾随舅姓氏称李树棠，号迎生（建国后复用原姓名）。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八岁时因家境贫穷随父母逃荒到涟水县北黄家圩，九岁时父病逝，又逃荒到灌云县，给富人家放牛，十一岁时回海州当雇工，放牛割草，干苦活，一直到了十六岁（一九〇三年），因生活难以混下去，就在海州应招当了冯国璋的“童子军”，先被送到天津附近的小站去学操练，后分到南京驻军第三独立旅教练一团当一名小班长，干了两年，常遭棍罚，因不堪忍受虐待苦，就想趁机逃出虎窝。这时我在宁已听说有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和华南宣传发动革命，还在广东的会党和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而且那里讲民主，官兵关系良好……于是我就想投奔到那里去。一天军中发饷，我拿到四块现洋，就开小差跑到和平门搭上了火车到了上海，又乘船抵达了广州，投奔粤军充当教练兵。

一九〇五年九、十月间，我听说中山先生已在日本东京把几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

^① 刘树亮现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现年一百岁。

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感到十分兴奋。到一九〇六年底，同盟会已在广东新军中发展成员，我就自愿参加了这个革命组织。这个时候，我结识了同乡王懋功（徐州人），他在粤军中担任团长，我们两人几次见面交谈，彼此比较投机。一天他对我说：“粤军中有个讲武堂，是培训军官的，我考虑到你的前程，介绍你到那里学习好吗？”我随即答应：“好啊！”于是，我就进了讲武堂学习。这时候，中山先生正为革命事业操劳，常常奔波于海外与华南之间，频繁地在广东会党、新军与民间中进行宣传与发动，还到粤军讲武堂来演讲，鼓动革命。有一天，王懋功陪同中山先生来到，他见到我时就把我介绍给中山先生，我当时激动得心直跳，日夜盼望见到的伟人竟站在我的眼前了。中山先生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目光炯炯，而又是那样和蔼可亲，他伸出手拉住我问道：“你当过兵吗？”我说：“当过。”又问：“你有文化吗？”我说：“不识什么字。”他勉励我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前程无限，革命事业正需要你们这些青年啊！”他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经过两年学习，我从讲武堂毕业，被分到粤军中当排长，很快又擢升为营长，先后被派到靠近澳门的前山镇和海南岛、雷州半岛驻防。一九一〇年奉令调回广州，这时，中山先生正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我作为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他召集我们讲话，勉励我们在行动时要“坚决、勇敢、机智”。我们就按照中山先生的布置举行了起义，可是由于准备得不充分，行动不统一，都归于失败。此后一个时期，我在粤军许崇智的部下担任营长，调防、转战于粤、赣、湘、闽各地。

二、讨伐陈炯明，东征得胜利

记得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一命呜呼后，陈炯明表示拥护孙中山，任援闽粤军总司令，进军福建，一九二〇年底回师广东，任广东省省长。这时他支持中山先生返回广东主持革命军政府，一九二一年四月举行非常国会，推选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自己就任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但他却暗中与北洋军阀相勾结。中山先生主张联俄，并决意北伐，陈表示反对，后来发展为公开叛变。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这天清晨，我在广州西郊白云山忽然听到了轰轰的炮声，感到奇怪，不知其原由，大家不免一阵紧张。后来才得知陈炯明的叛军在炮轰观音山总统府，还包围了粤秀楼（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住处）。我非常担心中山先生的安全，听说他事先已得到消息，在卫士的保护下转移走了，宋庆龄也已离开，我这才放下了心。过了几天，我得知中山先生已离开广州转移到军舰上，他还向我们发出了暂且转移、准备反击讨伐的命令。中山先生历经艰险，经过五十五天，直到八月十四日才转移到了上海。他抵沪后遂商筹改组国民党，组织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这时我在许的部下，由粤转赣，入闽攻下福州。

此时，中山先生决心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联络滇、桂、粤军共讨陈炯明，三军于十二月三十日誓师东征。经几路夹击，挫败了陈炯明，攻克了广州，陈仓皇逃到惠州老巢据守，所部退到东江、潮梅一带伺机进行反扑。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由沪抵穗，就任大元帅职，

宣布此后进入“讨贼时期”，把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设在广州东郊农林试验场，他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东征讨贼战争。这时我在东路讨贼军第一旅（旅长王懋功）第二团任团长，在东江一带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几次战役。是年四、五月间，在中山先生直接部署下，我参加了他所下令派遣的五千精锐劲旅出击淡水之役。陈炯明麾下的洪兆麟部固守淡水，经过几次激烈交锋，两下死命争夺，终于把洪部击退。随后不久，我又奉令率领全团去攻打永湖白花（白花），这地方山峦起伏，河道交错，我部到达以后，先观察了地形环境，然后我带了一部分官兵绕到敌后进行突袭。在我率先强渡河汊时，不意被占据在前面山头的敌军发现，他们架起机枪向河面上扫射，一颗子弹从左翼射中我的颈部，随即鲜血直流，水上飘起了血花，我晕了过去，我身边的警卫员杨道才、纪福生急忙把我架走。第五、六连奋勇冲锋还击，堵住了敌军。我被护送到一户农家，一位老农问：“你们是孙军还是陈军？”杨道才说：“我们是孙军，我们的团长是被陈军打伤的，请给我们方便方便吧！”老农“嗯”了一声就忙给我照护。这时，旅长王懋功得知我负伤，很快派人找到了我，立即把我护送到汕头医院抢救。那颗子弹从我的颈部左侧射进打断了食管，经大夫把食管接通，我的伤势才稳定下来。这时候，中山先生特派他的夫人宋庆龄前来汕头医院慰问。她说：“中山先生听说你与叛军英勇作战时负了重伤，非常关心，他赞赏你为国为民的奋不顾身的精神，要我前来慰问。”她关照医护人员要对我精心治疗照护，并亲自给我端来了牛奶，以后又来探望两次，还带来了经大元帅亲署发给我的五百元奖励金。顿时，一股暖流通过我的全身，我深深感受到中山先生对部下无微不至的关怀。经过一百多天的治疗，我痊愈了。经部队批准，我回家乡海州探亲。途经上海时，遇到同一部队的一位陆福廷团

长，他跟我谈起动员有志青年参加大元帅的讨贼军事，我说：“只要革命需要，我一定尽力！”我回到海州后，就访亲问友，串联宣传，一下子动员了二、三十个青年小伙子。我拿出自己的奖金作为他们的旅费，到了上海，引荐给陆福廷。陆对我说：“现在你的部队已编散了，我打电报给何应钦，如获同意就编到他的部下。”接复电获准，我就带了这二、三十个小伙子乘船到了广州虎门，见到了何应钦，他直接把他们编到桂永清部下。因我原在的旅团已解散，我觉得不好留下，就又离开了广州。经福建厦门时，竟遭敌方搜查，弄得一身如洗，我只得再艰难辗转返回了广州，只身投奔桂永清，述说我负伤回家后的经历。他深表同情，说道：“目下变化瞬息，你这位有功之臣也落到这个地步，暂且就委屈一下，先编在我的特务连当一名排长吧！”

是年九、十月间，中山先生经常奔赴石龙至博罗前线指挥督战。此时博罗城东西北三门都处在陈炯明叛军的紧紧包围之中，而城中守军又较单薄，增援部队一时难以调来。敌军重重围困了四、五十天，处境真是十分艰险，许崇智几次劝中山先生返回广州，孙一再断然表示：“决与博罗共存亡！”此时博罗守军的粮食弹药几已告罄，糙米都难得吃上，菜蔬更是困难，大家只得喝糙米粥，蘸盐卤汤，中山先生也同官兵一同吃这些东西。这时我也被困在博罗，身受先生精神的感染。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中山先生多次同守军讲话，鼓动士气，他说：“辛亥年间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他们热血沸腾，敢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向满清王朝勇猛冲杀，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现在我们手中拥有武器，战斗力又强得多，还怕不能打败叛军！”他急令杨希闵、许崇智组织敢死队进行冲锋突围，在各团挑了五百名官兵，我也在内，一齐从北门奋勇冲杀了出去，迅速夺下五个山头。豫军司令樊钟秀（又称“樊老

二”）赤膊上阵，身披红、蓝、黑色带子，手持盒子枪，冲锋在前，大队人马紧紧跟上，一股气连夺下十七个山头，直把陈炯明部打得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博罗突围以后，中山先生才返回广州议事。不久，他又重返前线，到达飞鹅岭，谋划如何攻破被陈部死死据守的惠州，并亲临前沿阵地视察，随与许崇智、刘震寰等部署总攻击事，还亲自调运来鱼雷用以炸城墙。十月底开始行动，炸响鱼雷，又放大炮，把城墙炸塌一段，步兵随即爬城，可是守军集中堵击，攻城又告失败。于是，中山先生重新部署了攻城战役。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我在桂永清的部下第一次参加了攻惠州城的突击战。惠州城三面环水，一面临山，南面飞鹅岭横亘，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我随着主攻先遣队从西门匍匐突进，敌军从城墙上射来子弹，我的大腿中了一弹，顿时鲜血直流，只得从前线撤了下来，被转移到后方治疗。这次攻城仍未能成功。

攻下惠州城，消灭叛逆军，统一广东省，这是中山先生的既定战略部署。他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后，这就成了他的遗言。这一年十月，就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组织第二次东征。这次按中、左、右三路纵队分路进军，中路纵队由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何应钦担任总指挥，有一万五千多人，我编在第一军第二师王懋功部一团担任团长。经编整后，十月五日从广州出发直奔惠州，途经石龙、博罗，至十一日直抵惠州城下驻扎。经侦察，确定北门为主攻方向，西门为助攻方向，并安置了攻击阵地，作好攻击准备。十三日上午，纵队部发出了总攻击令，炮兵先猛轰北门，城楼被击毁，城墙也被轰塌十多处。这时，何应钦下令步兵攻城，我团正在西北门待命，得令就迅猛攻击，不意敌军在城墙防地还架设着机枪，直向我攻击部队扫射，顿时部队仆倒，伤亡累累，我沿着倒下战友的血迹继续往前冲，子弹从我的右耳擦过，遂

退了回来。纵队调来炮兵又发炮轰击，把敌人火力压了下去。后稍事休整，到翌日下午再行攻击。纵队各部于中午前都到达攻击阵地，各就各位，我团仍从西门攻击，随带竹梯准备登城。午后攻击令一下，炮兵迅即发动轰击，压住敌军，随后步兵往前冲，我手举令旗挥动着，战友们奋勇地冲到城墙根，马上搭起了竹梯往上爬。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射出反扑的子弹，纵队又有许多战友倒下去了。但是敌军已是四面楚歌，犹如风卷的落叶。经纵队各部猛攻，终于破城而入。陈炯明的惠州驻军司令杨坤如中弹负伤，带着残部逃走了。攻惠州之役终于获得了全胜，而国民革命军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阵亡官兵有四百多人。就在纵队进入惠州城之后的几天举行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周恩来，还有苏联顾问罗加觉夫都讲了话，沉痛悼念这些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表明第二次东征之役的胜利是实现了中山先生的遗志。我参加了这次追悼会，不禁勾起了对中山先生的思念之意和对死难烈士的悲痛，同时也意识到今后征程的艰巨。

三、参加北伐战争，摧毁军阀势力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大会之后，中山先生系统地宣讲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六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在一所学校的大礼堂里听到他的这个讲演，当时我虽然坐在最后面，他那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的语调，却使我听得真切入迷，我的思想真被打动了。我感觉到：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从此就会有转机，革命的前途是

有希望的。同时，我还听到中山先生讲道：“本党成立以来，对内要打倒军阀，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来解放。”他特别强调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他说，要形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骨干力量，用来彻底摧毁封建军阀势力。所以，他首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创立并关注其建设。这所为培训北伐军官的学校办了两期（一期六个月）以后，即主要以这两期的毕业生为主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经受了实战的锻炼，取得了成功。东征结束后，就举办第三期，并成立了潮州分校。当时规定国民革命军中上自师长下至司务长，大小官员一律要集中受训，我是一名团长，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以后就来到了这所学校。在受训期间，我听过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深受教育，因为他是淮安人，我是海州人，算是同乡，两人谈起来很亲切。经八个月的学习，我赶上了北伐战争。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我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应钦是军长，我任特务营长，担负着全军的警卫任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鲍罗廷都随第一军行动。我派一排人组成自行车队，沿途一直护送着他们。周恩来向军队与民众讲话宣传时，都由我们担任警卫。我们每经一处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呼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北伐军进军迅速，势如破竹，很快进入了湖南，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重镇，占领了湖南全省，兵锋遂指向湖北。在北伐军打到汀泗桥时，吴佩孚率军进行顽强堵击，北伐军每发动一次冲锋，都付出重大伤亡。这时蒋介石用了激将法，他说：“汀泗桥攻不下，大家都回广东好啦！”黄埔的学生都发誓要攻破这个障碍，号称铁军的叶挺独立团冲在前面，终于拔掉了这根钉子。北伐军再进军到贺胜桥，吴佩孚想利用这个天险来阻挡，叶挺独立团遂迂回到敌后，

猛扑过去，敌军一部仓皇逃走，而吴佩孚又率军反扑，北伐军佯退，吴军中计紧追，在拥挤过桥时遭猛击，大败逃窜。再经过多次激战，终于完全控制了吴佩孚多年盘踞的老巢——武汉。随后，北伐军再进军江西，跟孙传芳军交锋，发生了反复争夺南昌的激烈战斗。蒋介石亲率王柏龄部硬攻，还是没有进展，第二次再率部围攻。这一天他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所，打开地图在观看，这时我带着警卫营的官兵前后护卫着他，只见他一时低头看地图，一时抬头望工事，刚要发出什么军令，电话铃响了，是程潜打来的，向总司令报告军情。蒋听到前线失利、伤亡很重的报告，急得脸色苍白，随即大声厉色地发令：“从现在起，师长阵亡，副师长代理，团长阵亡，副团长代理，营长阵亡，副营长代理，一定要坚持到底，非把南昌攻下不可！”后来又多次发动猛攻，加上各路军的配合作战，终于在十一月八日攻占了南昌。北伐战争进行到一九二七年，我调到顾祝同第九军担任中校副团长，随北伐军转战到浙江、安徽、山东，长驱直入，节节胜利。在进攻沂州府（临沂）时，直系军阀张宗昌正踞守在这里，我带领全团官兵猛攻到城下，爬梯登墙，但遭到敌军的顽抗，我的右膀又中弹负伤，我忍着剧痛，一股劲冲进了城里，张宗昌部溃败逃窜。

一直到北伐战争结束，我看到时事日非。蒋介石、汪精卫这些曾经背诵总理遗嘱、口称继承总理遗志的人，都背叛了中山先生，违背了三大政策；国民党军中派系斗争激烈，互相倾轧，非蒋嫡系都受到排挤。我想，自己进黄埔军校，参加东征北伐，都是为着追随中山先生，消灭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中国，既已用行动付与这个事业，那到此地步，也就暂告隐退吧！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初，我借口要回家照看母亲而辞职返回了海州。

（杨东野根据作者口述整理）